



周晓琳 刘玉平 著

空间与审美

文化地理视域中的中国古代文学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文化研究热的出现,人文地理学作为一门具有知识交叉性、系统性、整体性的学科在我国日益受到重视。该学科研究的不断推进及研究成果的不断问世,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将中国古代文学置于广阔的文化地理背景之下,运用人文地理学的相关理论确立新的研究观点,以人地关系为切入点,以区域和空间为研究主线,通过把握古代文学地域特色,进而深入认识其发生和发展规律,逐渐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诸如屈原与荆楚文化、魏晋文学与中原文化、南北朝诗歌的地域色彩……等研究课题均有不同形式的新成果产生。



空间与审美

文化地理视域中的中国古代文学

周晓琳 刘玉平 著

责任编辑:王怡石

装帧设计:薛磊

责任校对:高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间与审美——文化地理视域中的中国古代文学/周晓琳 刘玉平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

ISBN 978-7-01-007957-8

I. 空… II. ①周…②刘… III. ①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②文化地理学-研究-中国 IV. I206.2 G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5244 号

空间与审美

KONGJIAN YU SHENMEI

——文化地理视域中的中国古代文学

周晓琳 刘玉平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2

字数:330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01-007957-8 定价:4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周晓琳（女）、刘玉平（男），西华大学文学
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他们长期合作，共同完成
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项，四川省
教育厅科研项目2项，四川省教育厅青年项目1
项。出版学术著作《艺术的幽思——琴棋书画》
（四川人民出版社）、《中国文学的伦理精神》（四
川人民出版社）、《中国古代作家的文化心态》（巴
蜀书社）、《中国古代文学女性形象新论》（作家出
版社），获四川省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二等奖三等奖各1项，四川省社科联优秀成果
奖1项。

责任编辑：王怡石

封扉设计：薛磊

HE 河上 视觉艺术
SHANG yoyoylp@vip.sohu.net

本书为：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四川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

西华师范大学重点学科建设资助项目

目 录

绪论一	中国古代文学地域性研究的原因及其意义 /1
绪论二	中国古代文学地域性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19
第一章	中国古代文学与地理环境的不解之缘 /29
第一节	自然地理的文学呈现 /31
第二节	文学发展的自然地理基础 /52
第三节	古代作家“故乡情结”的地理因子 /67
第二章	古代作家的审美心理与地理环境 /85
第一节	自然地理环境与古代作家的审美体验 /87
第二节	“中原”背景与魏、西晋诗歌的抒情特色 /104
第三节	“江南”意象与古代作家的适意生存 /112
第四节	“蜀道难”主题的改写与自由意志的表达 /127
第五节	巴蜀之雨与杜甫审美心态的嬗变 /139
第六节	行走与自然地理之美的文学呈现 /145
第七节	古代作家的审美创造与人文景观 /167
第三章	古代文学的政治品格与政治地理环境 /181
第一节	中国古代作家的“长安情结” /183

- 第二节 “金陵”意象与古代作家的怀古心态 /192
- 第三节 政治地理与古代边塞文学 /201
- 第四节 “青海”意象与古代作家民族文化心理的嬗变 /214
- 第五节 政治地理与古代贬谪文学 /225
- 第六节 逐臣遗迹：激发历史回音的人文景观 /238
- 第七节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江湖” /253

第四章 古代文学创作与发展的经济地理环境 /267

- 第一节 区域经济与文学地图的描绘 /268
- 第二节 中国古代城市文学述略 /289
- 第三节 中国古代文学的城乡冲突主题 /308
- 第四节 区域经济环境影响下的作家饮食习性及文化心理 /320

主要参考文献 /335

后 记 /343

绪论一

中国古代文学地域性研究的原因及其意义

人类与地理的互动关系衍生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地理现象，人类对文化地理现象认识的逐渐拓展与深化促进了人文地理学的诞生。人文地理学“是以人地关系的理论为基础，探讨各种人文现象的分布、变化和扩散以及人类社会活动的空间结构的一门近代科学”^①，它所涉及的研究领域极其广泛，但始终以区域和空间为研究主线，正是由于这一点，中国古代文学进入了人文地理学的研究视野。在中国古代文学多元共存的发展格局中，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学创作总是彰显着风格各异的艺术魅力。文学创作作为人类文化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始终从时间和空间的两个方向坐标上显示自身的存在，产生与发展均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从时间意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义上讲,不同时代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社会秩序的稳定程度、主流话语的价值导向、风俗民情的演变状况等因素均在不同层面上构成了个体生存的特定环境与创作背景,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制约、影响着作家的观照视角与创作取向,不同时代之间既相互区别又彼此照应的关系赋予古代文学作品明显的“历时性”风貌;从空间纬度上看,作家的创作总是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内进行的,地域界限决定了个体作家写作行为的空间范围,无论是直接活动的空间范围,抑或间接活动的空间范围,均因其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而对文学创作产生显在或潜在的影响,尤其是当由地域环境而形成的文化隔离现象产生后,个体的创作甚至因显示地域文化的性质与特征而成为该文化系统的表征,如屈原的《离骚》、《九歌》。从地理文化的角度审视中国古代文学,运用人文地理学的相关知识建立研究的背景与框架,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入、系统地揭示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现中国古代文学的地域性特征与民族风貌。

一、自然地理系统为古代作家提供了物质生活环境与审美观照对象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在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形成和发展,地理环境即指地球表层人类居住与活动的空间范围,是围绕人类社会的气、水、地以及生物界的有机组合,此乃人类一切生命活动的物质起点。特定的地理环境经由物质生产这一中介,为不同的文化类型奠定物质基础,为人类的文学艺术活动提供物质生活环境与审美观照对象。人类文化发展初期,生产力极其低下,原始初民对自然环境依赖性极大,普遍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方式,利用外在的自然环境并将其改造为自身的物质生活环境,不同的地理环境(包括地形、地貌、纬度、气候、物产、生态等)为人类的物质生活与生产方式提供不同的自然条件和自然富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鲜明地域标志的文化类别,如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草原文化、海洋文化等。原始先民的思维形式非常简陋、幼稚和粗糙,刚刚拓展的审美视野十分狭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思维特征和表达方式,决定了那些完全未受人类活动

影响或受影响程度较小的自然综合体即自然景观,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他们主要的认识对象与观照对象,由此决定早期的“创作”主体以“在场者”的身份与眼光。在场者进行描写和表达往往带有“这一个”或“这一次”的性质,其显著特征便是细节与情景的逼真化,而带入自然地理物象和对地理背景进行交代性描述正是逼真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即使回忆历史也不会滤尽感性因素与地域色彩。在经历了与自然的长期接触和无数次冲突之后,地理环境所形成的强刺激逐渐在先民大脑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成为其记忆库中最容易被激活和提取的信息以及观念形态的物化表征,这就是中国的上古神话里出现众多的地名(如东海、河、渭、羽郊、羽山、冀州、不周山、涿鹿、羊水等)和自然物象(如鸟、蛇、山、水等)的缘故。

围绕每位个体作家,构成其创作空间背景的地理环境必定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本人的出生地以及一生行迹所到之处的自然地理条件,二是所属民族文化诞生与发展之地的自然地理系统。前者通常以一种可感的形式为文学文本涂抹地域色彩,尤其是作家笔下的自然山水与动植物通常充当着特殊地理背景的显现物,后者则通过逐渐渗透的方式,于不自觉中影响作家的生存方式、思维品质以及对环境的感知能力,从而对其创作活动发挥潜在而巨大的作用。因此,我们在考察中国古代文学产生的自然地理背景时,必须建构起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有机统一的研究框架,并将对比的手法贯穿其中。

首先,有必要以西方文化与文学产生的自然地理条件为参照系,从文化发展的源头去寻找中国文学的地域之根,在中西对比中把握中国古代文化与文学的地域性民族性特色。古希腊文明被视为欧洲文化乃至整个西方文化之源,因为“希腊和罗马恰巧就是古代世界各民族‘历史发展’最高的国家”^①,它的孕育之地是希腊半岛。该半岛以海拔在2000—3000米的品都斯山脉(系狄那里克·阿尔卑斯山南延部分)为脊梁,境内高峰连绵,山势雄伟。山以西为埃皮鲁斯丘陵区,主要为石灰岩地层,山以东呈现山地与盆地交错的地形。由于地表的断层与沉陷,希腊半岛海岸曲折,沿海多半岛和岛屿,尤其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13页。

是东面的爱琴海域岛屿星罗棋布。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初期,如此贫瘠的山地显然不具备良好的农耕自然基础,不过,四通八达的水路为那里的居民提供了航海交通、向外扩展的天然优越条件,而适宜的温度和澄明洁净的天空又给希腊人最初的身体成长与心理发育以影响,所以,18世纪德国古典主义美学家温克尔曼在寻求古希腊艺术完美的原因时指出:“他们国家的幸运的地理位置是造成这些优势的基本原因”,“气候的影响应该使那些能够从中生长出艺术的种子复萌,从这个意义上说,希腊的土壤是十分有利的。”^①当以大海为中心的地理环境成为激活古希腊人生命原动力的重要因子后,海洋蓝遂成为古希腊文化诞生的空间背景所特有的基本色调。著名的《荷马史诗》取材于特洛伊战争,特洛伊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使茫茫大海理所当然地成为该故事的背景,大海、风暴、巨浪、洪水、战船、木船、船队、海滨、深港等词汇不断地出现于故事的叙述过程中,交战双方海上的搏斗更是重要的故事情节,它们在隐喻的层面上告诉读者,海洋以其独特的物质属性铸就了古希腊人的生存方式,并且为其提供了与之相联系的一系列审美观照对象。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诞生于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受自然环境、气候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生活在那里的先民只能以农作物耕种为主业。在农业经济中,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土地,人与土地、河流组成了相互依存、和谐发展的共同体。农业生态环境决定了中华民族的祖先“春耕秋收”、“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方式,为他们提供了粟、稻、麦、葛、麻等生活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养成他们的饮食、穿着、居住等一系列习惯。当先民们怀着强烈的功利目的开始早期的艺术活动时,自身的物质生活与四周的自然环境,便进入了文学艺术表现的范畴。从“三人操牛尾”(《吕氏春秋·古乐篇》)的原始舞蹈,到“断竹、续竹、飞土、逐穴”(《吴越春秋》)的古老弹歌,从“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淮南子·本经训》)的焦虑,到“土反其宅,

^① [德] 温克尔曼:《论古代艺术》,转引自范明生著《西方美学通史》第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841页。

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礼记·郊特性》）的祈祷，从“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万亿及秭，为酒为醴”（《诗经·周颂·丰年》）的欢唱，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诗经·豳风·七月》）的铺写，原始初民从狩猎到牧畜农耕的生产方式与生活内容（包括风俗习惯、愿望要求）得到了全面的表现，所有的描写都被纳入以土地之黄为基调的空间背景之中。正是由于黄土地的孕育，中国古代文学具有迥异于西方文学的地域特征。尽管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内容日趋丰富，审美视野也不断扩展，直接描写农业生产和农耕生活的作品越来越少，但是，自然地理物质形态的作用总是会以不同的方式渗透进每位个体作家的日常生活之中，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地理因素的浸染，无论喝粥、品茗、饮酒、服药、折柳、采菊、种竹、打枣、赏梅的主体行为，抑或鸡鸣、狗吠、鸢飞、鱼潜、泉流、木荣、风拂、雨落的自然律动，无不显示着与地理环境的内在一致性。西方大文豪歌德是这样赞美古代中国人的生活环境的：“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你经常听到金鱼在池水里跳跃，鸟儿在枝头歌唱不停，白天总是阳光灿烂，夜晚也总是月白风清。”^①这种感觉尽管并不完全准确，不过其中所展现的东方文化赖以产生的自然环境以及人地之间的和谐关系，无疑揭示了异域文明的一大特征。

其次，我们应该充分注意到中国大陆内部南北地域分异的基本规律，在共时态的观照中进一步感受南北文化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摄的互动共振，充分认识古代文学创作风格以二元为主、多元并存的区域性特色。

越是经济、交通不发达，人类思维能力亦不发达的时代，山水切割、地域分异的现象就越突出，文学作品所涵盖的地域范畴也就越狭小，其中地域色彩也越浓郁，出现在《诗经》十五国风和楚辞中的众多地名、动植物名与各地方言即系显例。秦汉以来，随着中国政治文化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国人的观念形态在继续保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情”的区域性的同时，逐渐凸现了南北分异的观念，以至于论及文化与文学的发展状况时常常南北对举。当

① 《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12页。

然,南北方位的具体界定具有明显的时空相对性。中国领土幅员辽阔,地形地貌类型众多,气候气象各不相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圈。如果从宏观的角度按照经济类型进行划分,无疑可分为农业经济和草原游牧经济两大完全不同的文化区域,在古代中国文化地理坐标图上,草原位于北方,以此为参照系,以阴山山脉为界线,面积广阔的农业经济文化区相应被整体性地视为南方,苏武牧羊北海,闻汉武帝崩之所以“南向号哭”(《汉书·苏武传》),原因正在于此。两种彼此为参照系的文化在长期的接触共存中,一方面不断产生矛盾与冲突,从而导致国人南北对峙观念的产生和日益强化,南北冲突的实质与核心是民族冲突。“塞下秋来风景异”,人们对于异质文化的感受首先来自异地的自然景观与物质生活方式的差异,文学风格的差异便以此为基础而产生。耕地和草原,既是两大文化圈赖以产生的自然条件,也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各自生活与表演的大舞台,“陌上柔桑破嫩芽”和“风吹草低见牛羊”,分别在最直观的层面上形象地揭示出两个民族经济环境与经济生活的根本差异,而所谓“骏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则成为南北两大经济区域自然风物最具代表性的描写,类似描写在古代诗词中比比皆是。中原作家的恐北心理首先是源于对塞外的物质生活方式及自然景观的异类认同,明代于谦《塞上即景》诗所描写的画面:“目极烟沙草带霜,天寒岁暮景苍茫。炕头炽炭烧黄鼠,马上弯弓射白狼”,正是异类认同的典型例证。另一方面,南北两种文化又在长期碰撞冲突中实现着交流与融合,这种交流和融合始于物质的层面,由此进一步向精神领域渗透,高度发达的汉民族文学对此作出了迅速反映,“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尤其是有唐一代的诗歌形象而全面地表现了异域文化对中原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影 响,胡琴、琵琶、胡笳、羌笛、箜篌、胡角、胡服等之所以成为古典诗词中的一类意象,正因为它们已经成为汉族作家群体的审美观照对象。

东西走向的山脉和水系是中国大陆十分重要的自然分界线,以它们为坐标便在不同范围内形成新的南北分域:横贯中部的长江将国土一分为二,从而导致江南江北地域概念的出现;淮河是亚热带湿润区和温暖区半湿润区的分界线;秦岭不但成为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和水田农业经济文化

—中国古代文学地域性研究的原因及其意义—

区的分界标志,而且为夏绿林与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的分界,“林木被繁霜,合沓连山红”,唐人储光羲《登秦岭》描绘的当是岭北景物;同样东西走向的南岭则成为华中地区和华南地区的自然界线。秦汉以后,这种地域面积有所缩小的南北相对形势的形成,在特定历史时期如南北朝和南宋仍然取决于民族矛盾尖锐激化的政治因素,但在大一统朝代中则主要受制于地域分异的基本规律。不过,由地域分异而造成的各地区、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势必通过人们对于地域差异的认同性来影响作家的价值判断和审美趣味,“委身适荆蛮”,“莫令炎瘴送生涯”,“共来百越文身地”之类著名诗句,表现的正是历代作家因历史积淀而形成的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本位立场。从中观的角度审视,农业文化区内北方作家的惧南心理更多出于对异地文化环境(包括物质生活环境与自然生活环境)的排斥,明人吴国伦《高州杂咏》形象地揭示了惧南的原因:“粤南天欲尽,风气迥难持。一日更裘葛,三家杂汉夷。”当南北不同的物质生活与自然景观进入审美领域之后,无疑会引发出创作主体不同的审美情感反应。

山水切割在造成各地文化交流阻隔的同时,也强化了文化的地域性特色。与自然地理的分异状况相对应,中国古代文学也大致呈现出二元为主、多元并存的创作格局,除了南北文学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如先秦诗歌的南骚北风,南北朝民歌的南艳北质,元明戏曲音乐的南柔北刚)之外,不同地域的文学诸如河淮文学、河北文学、河东文学、河西文学、关陇文学、江东文学、巴蜀文学等等,也均从观照对象的角度折射出自然地理系统影响的存在。这种影响另一个非常突出的表现便是诗歌中地理意象系列的存在,诗人所到之处的自然景物作为主体情感的引发物,一旦被纳入诗中成为意境创造的有机组成部分,遂赋予文本明显的地域色彩。巴蜀作家群体的构成一般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巴蜀籍作家,一是寓川文人,他们的作品共同展示了巴蜀的地域风貌,前者如新都人杨慎,蜀中的锦江、剑江、嘉陵江在其笔下特色鲜明,后者像越州山阴人陆游入蜀,蜀中山水如剑门、锦屏山、神女峰、锦江等亦成为其剑南诗稿中的重要意象。苏轼贬谪岭南,岭南风物如大庾岭、白水山、罗浮山、朱明洞、碧落洞等以及瘴雨蛮村、溪山黎峒、海风潏气、荔枝桄榔、竹角藤梢等,不断出现于笔

下。这足以说明在最直观的层面上,自然地理系统构成了作家创作的直接空间背景。

二、自然地理环境影响古代作家的文化性格、环境感知和审美心理结构

自然地理环境之于人类,不仅仅是外在的生活环境,更是铸造人性人情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它通过人类自身的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培养人的性格气质,形成风俗习惯,即如《晏子春秋》所说“古者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以此为基础,铸就具有地域特色的民族性格与群体审美心理结构,最终导致不同文学风格的产生。魏征《隋书·文学传序》关于“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的论述,以及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有关“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木,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的概括,均涉及地理环境因素对于文学风格形成的参与。

文学风格是作家的创作个性有机地融入文学作品之中并通过作品整体表现出来的独特鲜明的风貌和格调,作为精神特征之总和的创作个性由诸多要素构成,包括作家独特的生活经验、政治倾向、道德观念、审美趣味、心理结构、文化素养、性格气质等,其中生活经验、审美趣味、心理结构、性格气质的形成无疑与自然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个民族的发展历史,既是该民族与客观现实相互作用的过程,也是其成员性格气质形成和变化的过程。人们在适应和改造客观自然环境的历史进程中,无论内在的生理、心理,抑或外在的行为、表现,均要作出相应的反应,这种反应于持续中所显示的稳定性特征,作为历史积淀必然渗透进个体成员的性格气质之中,故黑格尔说:“这地方之自然的类型,这是与此土的子民之典型和性格有密切的联系。”在他看来,“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于土壤上,把他卷入许许多多的依赖性里边,但大海则挟了人类以超越那些思想与行动

之有限制的圈子。”^①对于地理环境与地界内居民性格气质的关系,古代中国人早就有明确而深刻的认识,班固《汉书·地理志》从“水土之风气”浸润的角度,描述概括国中各地之人不同的生活习性与性格特征,可视为其中的代表。

就整体而言,依赖土地而生存的农业民族,其性格既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喜动而不好静,豪放粗犷、勇猛中带有残忍有所不同,也与面海而居、长于航海经商的西洋民族富有扩张性和冒险性有所区别,他们体现出务实沉稳的倾向,安土重迁,平和稳健,好常恶变,知足常乐。与此相对应,思乡、叹别、怀旧、悼古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主题,汉民族作家笔下或弥散着浓郁的感伤情调,或营造出宁静的氛围,充分显示出性格中阴柔的一面。无论黄昏暮色中思妇的登楼望远,抑或西风夕阳下游子的痛苦吟唱;无论乡村农家的田园牧歌,抑或江渚山林的渔夫樵子,古代文学诸多常见的题材与意象,都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出农业民族固有的“土地情结”以及向往平和、安稳、团圆的人生态度。从局部来看,同一国家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作家,由于不同水土风俗的浸染,其性格气质也会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差异。楚国先民筚路蓝缕,以处草莽,奇绝瑰丽的山川溪石、林莽湖泊,千奇百怪的草木虫鱼、飞禽走兽,在促使楚地产生“信巫鬼,重淫祠”风俗和树立以奇为美风尚的同时,也使楚地人民情感丰富细腻、缠绵悱恻,富于想象和幻想的浪漫情调,屈原的作品全方位地体现了这一点。关中地区风高土厚,有四塞之阻,山河险固,歌谣多慷慨,文风多雄健,从司马迁、王昌龄、李益、柳宗元等著名作家的创作中不难发现源于关中风土的相同气质^②。蜀地土壤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缺少生存压力固然容易滋生“轻易淫佚”(《汉书·地理志下》)、“溺于逸乐”(《隋书·地理志上》)的民间风气,不过也完全有可能成为培养个体成员“不甚趋利,性嗜口腹”的生活态度以及不急不躁、不悻不狠、乐观平和的性格类型之基础,人们不难在司马相如、扬雄、苏轼、苏辙、文同等蜀籍作家身

① 谢谄微译:《历史哲学》,台北大林出版社,第134、150页。

② 参见李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52页。

上发现这样的性格基因。

在人类的审美活动中，自然地理环境的意义不仅在于作为观照对象而存在，更在于它以特殊的方式培养人类的审美感受，潜在地影响主体审美心理结构的状态。感受、经验、创造是审美心理结构的三个基本层次，主体对对象的感受是美感的起点，对象外在形式的物理属性如音响、色彩、线条的不断刺激在给主体提供审美信息的同时，也在不断促进主体感觉接收器的发达，强化和提高主体感觉、辨认、接受信息的能力，为主体审美直觉的培养积累经验，而这种经验正是主体迅速进入美感共鸣状态的内在根据，亦是其进行审美创造的基础与前提。荆楚大地不但为楚人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为他们审美心理的建构提供了独特的地理环境，温和多雨的气候使那里的花草树木尤其繁盛，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楚地人民的心灵与楚地的草木之间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对应关系，他们以木为国名，用香花香草祭祀神灵，习惯于借助草木表达心中最美好和神圣的感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屈原笔下才会出现一个以树木花草组成的意象群，在展示楚国风物之美的同时，凸现了诗人的人格美理想美，由此奠定了中国古代诗歌的“香草美人”传统。中国古代山水诗之所以成熟于南朝并蔚为大观，除了政治、哲学、经济以及文学自身发展等多方面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地理环境的作用。由于晋室的南渡，当时的士族大庄园多处于风景秀丽的江南地区，东晋及刘宋时期的著名文人的主要活动范围内多明山净水，翠峰碧波，鸟语花香，呈现着一种迥异于北地风光的南国清韵，长期生活在那里的作家经过无数次与对象的接触和交流，灵性得以滋润和启发，大脑皮层所形成的优势兴奋中心将他们的审美注意力直接导向独具特色的江南山水之美，在主客体的长期相互作用下，自然景物的清音、清辉、清气以不断浸润的方式参与作家审美心理的建构，使之逐渐具备对秀丽之美的感知能力和内模仿能力，主体的情感节律与对象的运动节律所形成的同构关系左右了以谢灵运为代表的诸多山水诗人的审美趣味，描写自然山水的清美秀美遂成为山水诗的重要内容。刘勰《文心雕龙·物色》在分析《离骚》描写景物用语成功的原因时，明确提及“江山之助”的作用。“物色之动，心亦